

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

先秦諸子兵學思想與《孫子兵法》相關論述之研究

計畫類別：個別型計畫

計畫編號：NSC93-2411-H-002-075-

執行期間：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

執行單位：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

計畫主持人：何澤恆

報告類型：精簡報告

處理方式：本計畫可公開查詢

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29 日

一、中文摘要

先秦諸子兵學思想與《孫子兵法》相關論述之研究

本計畫擬探尋先秦諸子書中有關兵學之主張，一方面欲釐明各家軍事論述宗旨與其總體學術核心思想之關聯，比論其異同；另一方面，亦欲藉此一探諸家相關論說與先秦專言軍事的兵書代表著作《孫子兵法》之關係。為使主題集中，以儒、墨、道、法四家為主要研究對象，包括《論語》《墨子》《老子》《孟子》《莊子》《文子》《管子》《晏子春秋》《商君書》《鶡冠子》《荀子》《韓非子》《呂氏春秋》，以至三十年前馬王堆出土之《黃帝四經》（含《經法》《十六經》《稱》《道原》等四篇）古佚書。至於《孫子兵法》以外的兵學專書，以及如農家之類等其他專業流派，則不納入。本計畫擬撮取其中最主要之軍事論述，類分為三項主題探究：一為戰爭觀，即如何看待戰爭以及面對戰爭；二為戰爭中的勝負論，即勝負因素的意見以及國防觀；三為具體之治軍主張及作戰方略。分別就關鍵之文獻進行分析歸納整理，以求得較具系統而清晰之脈絡。

Abstract

Studies Into Militarism Among The Thinkers Of Pre-Qin Times, Sun Zi Bing Fa, And Related Subjects

The goal here is to, by way of studying the representative writings of the important pre-Qin thinkers in terms of notions or advocacies related to militarism, link the pre-Qin thinkers' militarist stances to their intellectual thinking in general, and attempt to compare such to that in Sun Zi's *The Art Of War*, hoping to detect or interpret any relationship.

To keep the studies focused, the proposal is to concentrate on the four largest schools of thinking: Confucianism, Mohism, Taoism, and Legalism. The Bibliography includes: *The Confucian Analects*, *Mo Zi*, *Lao Zi*, *Mencius*, *Zhuang Zi*, *Wen Zi*, *Guan Zi*, *The Years of Yan Zi*, *Book Of Shang Yang*, *He Guan Zi*, *Xun Zi*, *Han Fei Zi*, *Lu'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*. Also examined will be the four ancient manuscripts previously lost but unearthed and recovered thirty years ago at Ma Wang Dui, namely the *Huang Di Si Jing*, which includes *Jing Fa*, *Shi Liu Jing*, *Cheng*, and *Dao Yuan*.

Three aspects have been chosen as the principal focus of these studies: The first being the author's view on warfare—how wars are conceived, justified, and undertaken; The second being how they define and obtain victory, avoid defeat, and devise defense; The last being their realistic teachings on training the troops and warring strategies.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inspection of the manuscripts in these areas, we hope a clearer perspective of the early militarist

tradition might emerge.

Key words : The thinkers of pre-Qin times 先秦諸子, *The Art of War* 孫子兵法, Military thought 軍事思想, War 戰爭.

二、緣由與目的：

過去十餘年間，本人之研究興趣集中先秦儒道兩家學術，復以近數年在系中承乏《周易》《老子》兩課程，尤對近人研究此二書之相關問題多加注意，因探及二書中之兵學思想，而重心則落在與《孫子兵法》關係之探討，先後以「《老子》論兵與《孫子兵法》關係研究」及「《周易》與《孫子兵法》關係之研究」為題從事研究。今所提研究計畫即為原初設計之後續研究。蓋春秋戰國期間，列國侵伐，戰爭頻繁，故不惟產生不少軍事專門著作，即思想家亦幾莫不談兵，可徵此論題在當時學術思想中實占一地位。故擬進一步探尋先秦諸子書中有關兵學的主張，一方面欲釐明各家軍事論述宗旨與其總體學術核心思想之關聯，比論其異同；另一方面，亦欲藉此一探諸家相關論說與專言軍事的兵書代表著作《孫子兵法》之間的關係。

三、結果與討論：

（一）先秦諸子的戰爭觀

反對戰爭是先秦諸子的主要基調。

儒家主張以禮樂治國，不輕易言兵，對戰爭則採謹慎嚴肅的態度，《論語·述而》：「子之所慎，齋、戰、疾」，即是最明白的宣示。孟子承孔子之學，倡仁義，貴王賤霸，主以德服人，行仁政以王天下，故竭力反對兼併戰爭，對「殺人盈野」「殺人盈城」的不義戰爭痛加譴責，謂發動者「罪不容於死」，「善戰者服上刑」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對弔民伐罪的「義戰」卻持肯定的態度，以桀紂為殘賊獨夫，不斥湯武革命為以臣弑君，反認為民解厄，故民大悅如時雨降。但到了先秦最後期的儒學大師荀子，便大大改變了孔孟以來的舊觀念。〈議兵〉一篇，充分展露其軍事思想。他已公開主張富國強兵，唯以為只有實行禮治，重視教化，才可以養成威行天下的仁義之師。

道家老子反戰更屬典型，他認戰爭為凶事，謂「兵者不祥之器」，「故有道者不處」，其著眼點即在戰爭對民生的破壞。但對「不得已」的戰爭，老子並未排拒，只仍主「恬淡為上」與「善者果而已矣」。總之，好戰是「樂殺人」，最要不得，故為道者「不以兵強天下」。同屬道家的莊子卻很少論及兵事，在其思想體系中，無論興兵或偃兵，皆屬違逆自然多餘之舉，故並所反對。〈則陽篇〉對觸蠻二氏蝸角之爭的諷刺即可見他對興戰的蔑視；而戴晉人對犀首、華子與自身的遣之又遣，又可反映他齊物不遣是非的主張。儘管如此，我們

也自然可以體會莊子旨在弭兵的最終用心。道家又別有文子，其人或謂是老子弟子，其書之時代則頗有爭議，要之亦當成於戰國而後人復有所增益者。彼與老子不同之處，即在繼承了老子對戰爭的若干論調的同時，卻積極提倡用兵，強調義戰的必要性；此亦反映戰國中晚期諸子思想相互吸收融合的一大趨向，道家後學顯然吸納了儒墨兩家的一些意見。這一現象同樣見諸近時出土於馬王堆的《黃帝四經》之中。唐蘭考其書著成於戰國前期之末以至中期之初，信否縱謂未能遽定，要之為戰國黃老道家綜合刑名而提出「刑德相養」的主張，故對戰爭的態度，也遠較老子為積極。雖亦云「作爭者凶」，卻同時又說「不爭亦無以成功」，故特提出「天極」為準則，認為戰與不戰，一應以天極為依歸。其於侵伐掠奪的戰爭和義戰的態度，亦一如文子，所以這幾可視為戰國諸子看待戰爭往後發展之一共識。此外，尚有《鶡冠子》一書，傳自先秦，《漢志》亦入道家，但內容駁雜，大抵兼含黃老刑名與陰陽、兵家之說。彼謂「兵者，禮義忠信也」，又說聖人之道須「先人」，而人道則須「先兵」，這與老子的言論已見其不大相同矣。

墨家反戰亦一如老子之典型。墨子也視戰爭為凶事，對戰爭所帶來的巨大災難有沉痛的控訴，故倡兼愛與非攻，可謂是一個徹底的和平主義者。但墨子同時也區分了「誅」和「攻」兩者之異，判別了義戰與非義戰，所以他也非一味地排斥戰爭。在這一點上，顯然影響到了稍後的孟子。

與上述諸家顯然不同者則為法家，最著者為商鞅。《商君書》中有鞅本人的著作，也有出其後學之所為者，要之頗可呈現「國之所以興者，農、戰」的核心主張。因此彼不僅主戰，抑且以為戰爭的功能為「以戰去戰」、「以殺去殺」。

作為先秦殿軍的法家學者韓非，雖承商鞅法治主張，重賞罰，勵耕戰，圖富國強兵而一天下，然一因於受學於荀卿，再則出身實力較弱的韓國，與商君出掌強秦有別，故亦誠輕啟戰端，同時亦崇重《老子》以柔克剛的教訓。

傳世復有《晏子春秋》一書，舊歸儒家，柳宗元疑其為墨徒所為。大抵晏嬰人在孔墨之前，書則成於儒墨興起之後，故亦汲取二家暨他家之論點。倡仁政，同儒家；憫弱小，同墨家；然亦主賞戰功、勵士氣，則又近法家而遠儒墨。

與上述諸家頗見不同者為管子。其書雖源於管仲，然實經戰國以來學者所增益改造，內有儒、道、法、兵、農、陰陽諸家思想。學者或謂其中部分著作出戰國稷下先生，故亦為一匯通融合諸家思想之書，就中儒法二家思想之分量尤重。與儒道不同，《管子》主張富國強兵，肯定戰爭「輔王成霸」的功用，但同時也強調「善之伐不善」的義戰，此則又使其與他家有共同相通之處。

最後尚有《呂氏春秋》，為戰國末秦相呂不韋集賓客所編，綜其前各家之說，而歸宗於儒家之德義教化與陰陽家之五德終始。特倡所謂「義兵」之說，謂「古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」，以為「攻無道而伐不義」的正義之戰乃振亂之妙方，有莫大的福利，遂對墨家非攻、救守的主張皆持反對。故其主用兵，主重農，主法術刑賞，皆極類法家，然其根本則立基於尚德順民，以此為立國之本，是則又以儒為宗。凡此皆可見先秦以還，主要思想家皆先極力反戰，而戰事愈益頻仍，乃漸而改趨面對戰國，正視戰爭，進而亦主張戰爭，唯諸家尚多辨戰爭之義與不義而已。其間思想之轉移變遷，隨戰國後期秦一天下的發展，自後視前，其跡顯然。

（二）先秦諸子的戰爭勝負論

儒家孔子以為治國之要，取信於民為第一義，故於「食」「兵」「民信之」三項，兵居末而信居先。即以用兵而論，認為人心向背成為戰爭勝負的關鍵，此一意見乃發展而為後來諸家所認可，實汲源於孔子。孟子以「仁者無敵」為總綱，其論攻守之勢，蓋莫不以民心之向背為依歸。彼謂「取之而燕民悅，則取之」，「取之而燕民不悅，則勿取」；又謂「鑿斯池也，築斯城也，與民守之，效死而民不去，則是可為也。」荀子雖一猶孔孟倡行仁政，但卻說「仁者之兵，所存者神，所過者化，若時雨之降，莫不說喜」，又說「兵者，所以禁暴除害也，非爭奪也」。其說雖亦可與孟子義戰相通，然強國強兵的言論之見於〈議兵篇〉者，無疑可以看到春秋戰國以來，儒家學者對戰爭的觀念和態度，已有根本性的變化。儘管荀子高舉王道，實則已注入了相當的法家霸道成分，故對治軍用刑賞、強兵革等法家所主者，亦多有所取；然而他也反對將天時地利、權謀詐變作為用兵的主要考量，而認為「壹民」「附民」才是勝負的關鍵，這顯然仍是孔孟以來儒家的傳統觀念。成書於戰國的《晏子春秋》則謂「能愛邦內之民者，能服境外之不善」；又說「露仁義而樂利世者，能服天下」；又說「不德而有功，憂必及君」，這些觀點其實都很近儒家。

老子認為「柔弱勝剛強」，反對強兵，謂「兵強則不勝」，要「不爭而善勝」。既主張「不得已」的作戰，故「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」。又主以「慈」治兵，所謂「兩軍相若，哀者勝矣」。案老子所謂「哀」是「哀慈」之義，是則仍與儒義相通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有「聖人之用兵也，亡國而不失人心」一語，其義亦與儒義相洽，唯莊子既徹底反戰，祛有為，故學者或疑其不類莊周語。而文子則基本上繼承了老子「柔弱勝剛強」的思想，認為「強大有道，不戰而克；弱小有道，不爭而得」；而同時又吸收了儒家所主張教化和仁義在兵戰中的作用，所以也要求在上位者修德行仁以施惠於百姓，以爭取人心的擁戴。他說「兵之勝敗皆在於政」，也可謂是儒家所啟一個傳統宏觀的大見解。《黃帝四經》重義戰，尚正名，主張「提正名以伐，得所欲則止」，如「興兵失理，所伐不當」，則天將降災。同時也本老子「柔弱勝剛強」而續

有發揮，轉化而強調以退為進，後發制人以求勝的思想。同樣受老子影響的《鶡冠子》則以為用兵須「知一不煩」、「以一度方」，所謂「一」，即近乎《老子》所謂之「道」，殆謂須以簡馭繁方可克敵制勝。可惜對此論題其書未再深入發揮。但他明確指出，「兵」居「人道」之先，「百歲不一用，然不可一日忘」，更把戰爭勝負的關鍵，繫在國君的賢否。其積極性自然遠出於《老子》之上。

墨子主非攻，重救守，亦可謂彼於軍事，非求得勝，乃求無敗。既不重攻取而重防守，故其書〈備城門〉以下諸篇，詳述各類防禦工事，上自部署號令，下及器械設施，論者以為可與《孫子兵法》相提並論。一般諸子論兵，多自理論切入，若墨子如此具體陳述者，誠屬罕見。

法家的商鞅，對戰爭的態度是最積極的，其主張重點可歸結為農、戰結合，以求富強；再則為重賞厚罰，以期民之樂戰而懲敗，然後其兵可以無敵。此等主張與諸家所主德教以凝聚人心者有本質上的歧異。這些主張其後為韓非子所繼承並進一步加強發揮。

與墨子相若，《管子》涉及軍事的論述也相當廣泛。前文述及其注重戰爭的正義性，故謂「勇而不義傷兵」，又說「軍之敗也，生於不義」，可見他認為戰爭的屬性影響勝負。此外，他還認為「內政不修，外舉事不濟」，以為內政修明才是戰勝的基礎。因此「與其厚於兵，不如厚於人」，這又折回儒家取信於民的固有主張。至於又說「地之守在城，城之守在兵，兵之守在人，人之守在粟」，將軍事結合政治、經濟來論述，強調農與戰的關係，則是法家的基本意見。

至於最後成書的《呂氏春秋》，主張治國治兵，莫若以「德」「義」為先，愛民而順民之心，所謂「仁義以治之，愛利以安之，忠信以導之，務除其災，思致其福」，只要民心甘為所用，則兵不在多，自可爭勝天下。而義兵師出有名，弔民伐罪，故可戰無不勝。此等主張與孟子皆極相近。但同時也強調「勇」在戰爭中是決勝關鍵，所以善用兵者要鼓起士氣，須「有以羈誘之」。

（三）先秦諸子的治軍主張及作戰方略

孔子絕不好戰，然晚年請討陳恆，則亦非一味避戰者。他嘗答衛靈公問陣，又嘗告子貢，兵與食皆可去，唯「民無信不立」，其不主張脫離禮治政事而獨談兵事，意極明顯。至於具體治軍意見，雖未詳說，但告子路「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；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」，用兵須戒慎恐懼而善於謀劃，此意明確獲得後來軍事學家的認可與繼承。孟子倡仁政，謂「以德行仁者王」，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」，恃民心可以無敵，皆承於孔子。又謂「不教民而用之，謂之殃民」，亦顯本於孔子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」的意見。因此孔孟雖未詳言練兵之法，但兵士先加訓練然後可用，也是毫無

疑義的。荀子主禮治，亦本於孔門，但強調富國為根本，才可強兵，因此更具體地注重農業生產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〈議兵篇〉論將帥所當具備的條件，頗論述了將士須服從指揮，凸顯了治軍紀律的重要性。

老子最有名的主張是「柔弱勝剛強」的觀點，故貴柔守雌，為客不為主，不敢進寸而退尺，這都與其整體思想核心價值觀相一致。前人有謂《老子》是一部兵書，又認老子「以奇用兵」一語即與出奇制勝、兵不厭詐同旨，實則皆有所誤解。至老子主士兵因慈而勇，哀兵致勝；而謂「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者敵者不與」，切言須戒輕敵，則並與儒義相通。其後《文子》除承襲《老子》這些重要觀點外，進一步強調「義兵」作戰的策略和紀律，對用人的原則也有所揭示。特別指出人之才具各不同，須「兼用而材使」，各因其長短而作合宜的差用。更進一步主張「因其自為用」，以發揮兵士的主動性。尤可注意者為提出「廟戰者帝」的論點，雖也與孔老以來審慎備戰的向來見解相符，但與《孫子兵法》「廟算」之義形神相合，應是受其影響。同樣發揚老子之道的是《黃帝四經》，但〈君正篇〉主張以七年時間修明內政，如從民俗、無賦斂、發號令、以刑正等等，然後可以即戎。雖然同樣是結合軍事和政事的主張，畢竟更見出其法天地之外，愈益加重了人謀的分量。《鶡冠子》則本老子「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」之說，用之於戰術，求「成功遂事，莫知其狀」，故謂「聖人貴夜行」，同時與「不戰而勝，善之善」之說相結合，蓋皆可謂有取於老氏之陰柔，而同轉為謀略。

墨子因主非攻，故專重救守，其〈備城門〉以至〈雜守〉今本凡十一篇，皆論防守，其於守城工事設施、軍需器械，以至號令部署，自戰前之準備乃至戰時的技法，極見其精通而周詳。此外，論守城「七患」，深明軍事與國家政治經濟的關係，也討論到君將關係與人才遣用等。故諸子中非攻色彩最濃厚的墨子，他所論述治軍戰法，有些處卻甚至比專言軍事的兵書還要更詳細和具體。

《商君書》主張以法治軍，厚賞重刑，倡樂戰，若畏戰退卻者，家人連坐，這在諸子的治軍策略中是十分鮮明的。更提出了具體的戰略和戰術：如謂「兵之大法在謹」、「論敵察眾，則勝負可先知」，幾可謂是兵家鐵律。又謂兵多器足皆不足恃，可恃者唯「鬥志」。又主張「四戰之國」貴守戰，而亦須發動壯男、壯女、老弱三軍各司其職，並切禁其互相來往，以免產生負面影響。

《晏子春秋》主賞戰功，以勵有智、力者各盡其能，其意頗近法家商鞅；彼亦謂「國安民和，然後可以舉兵征暴國」，亦可謂是儒法的綜合思想。

韓非子重耕戰刑賞，一如商鞅，但在將材的選用上卻有不同的見解。他反對商君以官爵賞斬首之功，而主張「任官者當其能」，宰相和猛將都須從基

層加以歷練選拔。他反對將帥「身先士卒」，認為只須信賞必罰以馭之即可。他提出法、勢、術相結合的思想，須節制將帥的權力，以防反側。

《管子》書在先秦諸子書中論述兵學的分量也是令人觸目的。《漢志》嘗把兵家類分為權謀、形勢、陰陽與技巧四家，《管子》書中對此四種幾乎皆有所涉及與論列。寓兵於農、號令刑賞可說是其治軍最大要領，也強調士卒的訓練，嫻熟戰技，更注意及於武器的精良。嘗論所以「無敵」者八要項，其中「財（材）無敵」「工無敵」「器無敵」三者皆為講究武器裝備，包括製作的材料、技術等從質量兩方面求提升，在諸子中是饒有特色的。

《呂氏春秋》也吸收了法家重賞罰的思想，但說「凡用民，太上以義，其次以賞罰」，同時主張「義賞」，以鼓勵人心向善。此處又見其有折返儒義之跡。〈簡選篇〉專論訓練與裝備，認為「兵勢險阻」之便、「兵甲器械」之利、「選練角材」之精、「統率士民」之教四者才是制敵決勝的可貴策略思想

（四）先秦諸家理論主張與《孫子兵法》內容的比較

明胡應麟謂《左傳》不言孫武，蓋戰國策士為說文之。清姚鼐亦謂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，未有興師十萬者，因以為《孫子兵法》乃戰國言兵者為之，託於孫武。日人齋藤謙且疑孫武與孫臏為一人，錢穆教授亦同其所疑。唯自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有《孫臏兵法》，學者又多回信舊說，以十三篇為武書。實則出土臏書確然可證武、臏為二人，亦各有其書如《史記》所載，然十三篇書中內容，則誠有如前人所疑，當出戰國而非春秋時代所得有者。故《孫子》或亦如許多先秦古籍一般，淵源於孫武，而續經後人所改訂。若據其有戰國時事或思想推定其必出後世，或因有臏書出土而還認其必出春秋末葉，似皆各得一偏。唯其書既初源於孫武，又摻入戰國內容，則居今言之，其大部分內容，頗難確判其先後。抑且戰國諸子之書，其性質亦輒多類是，則定指某家之說定出某家之後而受其影響云云，其事亦極不易。今姑暫捨不細辨各家先後而僅較其異同之略。若明白可知者，則屬例外。

一、孫子與儒家

孔子主德治與禮治，反戰反侵伐，然孔子及門下則多知軍事。夾谷之會，孔子即以武備迫使齊景公歸魯侵地。子路、公良孺皆稱有勇力。冉求善軍旅，告季康子曰學之於孔子。但主慎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；又重平日訓練，謂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可見孔子非不知兵，然最終則以為「善人為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」，蓋仍承春秋以來弭兵的主張。孫子則認不能去兵，且其事殆與政事相關，故謂「兵者，國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」，又謂「無恃其不來，恃吾有以待；無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」，對戰爭有不可避免的認知。至所論影響戰爭勝負的「五事」「七計」，大率與政治相關，而

「五事」中最高一層之「道」，即指「令民與上同意」，與儒家思想有相通相近之處。

二、孫子與道家

自唐以還，即有《老子》係一部兵書之說。余曾辨其不然。唯《老子》極言戰爭之慘酷；孫子亦知其弊，故主速戰速決，又主張「伐謀」「伐交」等手段以求達到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的最高目的，以避免長期戰爭帶來的困境。其「全勝」思想與老子「善勝敵者不與」之說相通。老子謂「慈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」，又謂善戰者「不武」「不怒」，更主為客不為主，不敢進寸而退尺，而禍莫大於輕敵；孫子則提出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」五項為將帥所當講求，可涵括老子所言而更周匝。又老子因主「柔弱勝剛強」，又嘗言「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」，又說「將欲歛之，必固張之」云云，以致論者或謂其主治國用正道，用兵則採詭道。其實不然，余亦嘗辨之。老子實主清靜無為而自正自化；明白主張「兵者，詭道也」的是孫子，所以他說要「能而示之不能」「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」云云，皆不宜與老子相提並論。舊說老子為孔子前輩，略早於孫子，則孫子自可受老子的影響而續有所發展。近年何炳棣院士力主《孫子》早出於《老子》，因謂《老子》辯證思維源於《孫子》。此一問題，未易遽定，要之二書思想有同有異，且《孫子》為專門兵書，若論兵學，自非《老子》所能比擬。

三、孫子與法家

先秦法家思想，至戰國而勃興，然其前春秋時代已先有其淵源，管仲、晏嬰等其選也。唯今管晏之書雖非盡出二人之手，然如管仲重積蓄、講械功，則可無疑，彼嘗勸桓公「作內政而寄軍令」。晏嬰勸景公「寬政、毀關、去禁、薄斂、己責」，則重內政可知；又薦司馬穰苴為將，則主嚴明法紀又可知。孫子亦極論戰爭與國內政經之關係，故主速戰速決，因糧於敵而以戰養戰。至於將帥之選擢，士卒之訓練，若謂孫子有繼承春秋法家前驅之思想，當不為過。嗣後戰國以來之法家學者，其兵學思想內容又有襲自孫子者，尤其到了戰國中晚葉，學術思想互相吸收融合的情況更為普遍，加之以戰事愈益有增無已，諸子對用兵之事自然加意關注，而其思想汲取於孫子議論者自無足怪。總之，孫子可謂是承前啟後的軍事家，其前諸子的軍事思想到他手上得以從質與量上飛躍提升，而對後續諸子的軍事理論思想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。

【參考文獻】

從略。